

贬谪中的苏东坡

品茗听涛

苏东坡仕途不顺,宦海沉浮,依旧不改率性而为的本色,艰难苦恨在他眼中都化作了清风霁月,于百姓家国,为国忧思、为民请命;于生活情趣,纵享清欢,快意江湖。他鲜少悲叹不幸,他总是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生活之美。携眷至杭州时,诗曰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;被贬黄州,他说“长江绕郭知鱼美”;被贬岭南,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修“朝云堂”,追寻仙道生活;“试问岭南应不好,此心安处是吾乡”;被贬海南,他说“海南万里真吾乡”。

黄州,是苏轼的命运转折点。被贬黄州期间没有任何薪俸,他脱下文人长衫,换上布衣芒鞋,躬耕于东坡,从此自号东坡居士。他在田间自得其乐,自己酿酒,还研制了东坡饼、东坡肉。写就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等千古名篇。苏东坡被贬黄州,也曾心灰意冷,“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”,有一天,大醉归来,江边长叹“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”,反思并痛恨自己,为什么忘不掉功名利禄,不甘平静地生活。直到夜游赤壁,他才明白,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,想世间名利得失,不过转瞬即逝,反而是明月清风,更值得欣赏与信赖。从此,苏轼放下得失欲望之心。黄州之后走向他政治生涯的最高潮,官至副宰相,也取得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“翰林学士”。试想一下,如果黄州时期的苏轼倒下了,怎么可能在年近半百却迎来命运的改变。在获得了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内心静定后,苏东坡更多地把生命融入了自然。

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,说自己少时写文章,喜欢高谈阔论、引经据典,看似才华横溢,其实都是科举文章套路。后来又应科举举,看似纵论古今、考辨是非、陈明利害,其实不过是为了顺应制举“直言极谏”的名号罢了。就好像鸟儿自鸣得意,于世其实无补。就像是树干上奇特的树瘤、石头上美丽的斑纹,似乎颇能取悦于人,但树瘤与石纹本来都是毛病(《答李端叔书》)。当然,苏轼也有自己的坚持,在给友人的信中,他表示虽然现在老而且穷,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,面对生死谈笑自如。可见,此时的苏轼有惴惴不安,有人生反省,同时也有自己的坚持。

苏东坡被贬至惠州,寓惠两年七个月。有意思的是美食家苏东坡在这里又创制了烤羊蝎子的新吃法,并酿出了桂花酒、黄酒、糯米酒。东坡改进惠州菜,制作了梅菜扣肉、东坡西湖莲等名菜。没有任何权力的他,仍不忘心系百姓,做了很多诸如“白鹤峰新局凿井”“助筑东新桥”等惠民工程(一从坡公谪南海,天下不敢小惠州),创作诗、词、文、书画354篇(幅),给亲友写了233封信。

晚年贬谪海南,已经是十足的流放。他年事已高,身边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,且不适应那里的气候,疾病缠身,于是他平静地为自己打造了棺木,做好了坟墓。“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”这表现出他佛家出世的精神。海南儋州的生活条件、水土气候、风土民情、语言差距都是相当大的,宋时海南属于孤悬海外的蛮荒之地,当时居民中几乎连汉人没有,主要是黎族人。从中原贬到此地的朝廷高官,相当于今天的无期徒刑。一旦被贬谪到此,一般很难活着回来。

元符三年,被贬海南三年之久的苏东坡终于获赦北归,六月二十日夜,渡海琼州海峡。这一天经历了狂风暴



火红的日子 盛近 摄

雨,然而当风雨散去,呈现在眼前的是澄然碧海,皎然月洁。他如此达观地总结自己的流放生涯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其中“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”这两句不仅仅是景色的描写,也是生命的觉悟。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这是苏东坡与苦难的和解,也是他对命运的超越。一次次贬谪,一次次重生,这些悲喜交叠的际遇,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与淬炼,终于让它呈现出纤尘不染的本来面目。

公元1101年8月24日,苏轼卒于特赦返回朝廷的途中(病逝于常州),亲属遵嘱移其灵柩至河南郑城上瑞里(今河南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)。临终前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“吾生无恶,死必不坠”,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,不会下地狱。

苏轼临终前用两句诗概括自己的平生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历经的种种坎坷和磨难,他只当作另一种形式的馈赠。他看透生活,而不厌倦生活,善于将沉重的荣辱得失化为过眼云烟,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安慰。在生意盎然活泼轻灵的景色中,苏轼发出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思考。钱穆认为苏轼在艰难的环境中更加显出了人格的伟大,比如在所谓的“三州”功业时期,他的诗词都好,特别是在黄州时期,他达到了文学上前所未有的辽阔和高峰,可是一旦安逸下来,诗境却时而落入俗套。

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中说,东坡在寂寞中反省过去,与山水对话,与古人交谈,与民同乐,向文学领域进军,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代大文豪的美名,完成了精神上的突围。余秋雨认为苏东坡处于逆境时自省,这种难言的孤独,使它彻底洗去了人间的喧闹,去寻找无言的山水,去寻找远逝的古人。在无法对话的地方找对话,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。
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当你观察生活、理解生活、接受生活,总能学会享受人生的每一道光,在艰难中活出高贵的样子,和东坡先生再次遇见,就在下一个春天。

夫子庙的租书人

陆建明

我儿时的夫子庙游人如织,热闹非凡,这里除了特色小吃、流行服饰、花鸟虫鱼外,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小书摊了。小人书不是卖的,而是用来出租的。租书人是位年逾七旬的老伯,他把一块木板倚在弄堂北墙,上面钉了一层层的木棧。花花绿绿的小人书用牛皮筋勒着,非常吸引游人的眸子。书架旁放着一些方凳,或是小马扎。我一有空就会结伴来这儿看看,选两本书,坐在秋日的暖阳里,颇有滋味地翻看。当时比较时兴《东周列国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小人书,每套书分为十多集,要借十几次才能看完。当时租书的价格是每本一分钱,而买一本新书则要一毛多,用买书的钱来租书绝对划算。

彼时的夫子庙有解放、秦淮和大光明等三家影剧院。身为男孩当然喜爱战争片,所以我特爱看《侦察兵》和《渡江侦察记》,尤其是《南征北战》。那时老妈给我的零用钱也够买张两毛五的电影票,可我走到售票口便舍不得掏钱了,想想这钱能供我借阅25本小人书呢。不看吧,心里也实在憋得难受。好在大半年后,根据影片缩影的小人书摆上了书架,不禁使我欣喜若狂。可是电影版小人书的租金要比手工绘制的贵上一倍,但我还是觉得便宜,以为拾到了麦子。我们在看小人书时,老伯也在读书,他读的是本繁体版的《儒林外史》。这是吴敬梓根据他在南京生活的经历写成的,也是晚清南京人生活的写照。我记得老伯手上的书已经泛黄,甚至有些页码已经跳脚了,但他依然爱不释手。

当时我的同伴比较偏爱素描,来此看书纯粹为了临摹书里的画面,如关羽、张飞、唐僧等,包括他们的坐骑、盔胄和兵器。我却痴迷故事的情节,对画面没有多大兴趣,我们可谓各取所需。偶尔我们也会有些争执,便是对曹操的为人产生了异议;或是对去西行取经的唐僧是否真有其人感到疑问,于是便请老伯辩证。他说古往今来对曹操的争议多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而关于唐僧是否存在,他说等你们以后读读历史就知道了。

在我的眼里,老伯是位老学究,戴着一副老眼镜,一撮胡子夹杂几根银髯,颇有几分教书先生的模样。果不其然,老伯在被我们问到经历时,说他生在清末一个没落小吏家庭,传承父亲喜爱读书的基因。打从他记事起,家里的境况已经举步维艰了。可是父亲依然想方设法供他读书,后来遇上北方军阀混战,于是颠沛流离,一路逃到江南。他和一群报童在街上卖报,幸得陶先生这时在推行平民读书运动,对他影响很大。他得到一本陶先生与人合编的《平民千字课》,不仅自己学会了,还教小伙伴们认字。成人以后,他进了一家印刷厂做工人,依然看书写字。1937年末,日寇攻进南京前,他跟着难民一起跑反,靠代人写信为生。抗战胜利后,他前往郊外一所小学任教,还当过校长,培养了一批批学子。他是六十七岁退下来的,待在家里闲得无事,便买了一些小人书对外出租,以便发挥余热。

老伯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,说四个儿女中有教师、技术员,个个都有出息。继而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,因为时代在发展,国家在搞建设,以后没有知识可不行。时光荏苒,四十多年过去了,老伯的话依然在我心里挥之不去,现在我依旧喜爱读书,确实离不开当年小书摊对我的影响。而老伯当年的教诲,更使我一生受益无穷。

